

THE TEACHING OF CULTUR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EN CHEN

陈申 著

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The Teaching of Cultur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陈 申 著

出版社



0245613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陈申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12

ISBN 7-5619-0672-2

I. 外...

II. 陈...

III. 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812 号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59 千字 印数: 0001-3 000

书 号: ISBN 7-5619-0672-2/G·9837

定 价: 16.00 元

序

陈申博士在他的《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出版之前,嘱我写序,使我有机会先睹为快。拜读之后,很受启发,便将一点感想写出来,就算是序了。

本书的核心是提出了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我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值得引起我国从事外语教学的人的重视。

所谓“文化创造力”,在我看来,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正确对待祖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态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多了,面广了,就存在一个态度问题。是全盘接受外国文化,而对祖国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呢,还是一概排斥外国文化呢?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是对外国文化进行消化,把其中优秀的、有用的部分吸纳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来。有了这种能力,也就可以说有了“文化创造力”。

这种“文化创造力”的培养,自然不仅是外语教学的问题,只是对外语教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学习外语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与外国文化的接触更为迅速、更为直接。把培养“文化创造力”作为外语教学的一项任务或一个目标,使青年人对外国文化有正确的态度,善于汲取外国文化的精华,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事业。这需要外语教学工作者作许多艰苦的努力,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陈申博士在书中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从古至今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考察了国外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教学与文化

的关系等问题,并作了细致的梳理。在这一系列的考察的基础上,他才得以提出外语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的建议。看得出,他在这上边下的功夫是非同一般的,是很值得称道的。我们读者也可以从他的这一部分研究大为获益。

我要特别向对外汉语教学界推荐这本书,希望具有英文阅读能力的对外汉语教师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对外汉语教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外语教学。我们也应该把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培养成具有“文化创造力”的人。陈博士的书,对对外汉语教师还有一点特殊的作用,就是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如关于外语教学中处理文化因素问题的发展过程,关于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的问题等。读过之后,会使我们在教学和教材建设中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知道别人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我们应该从哪里做起。

由此,我想到近些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一场关于语言教学与文化的关系的争论。虽然争论得沸沸扬扬,有些方面甚至超出了论题本身,涉及了对四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的估计,涉及了办学路子,但是我隐约地感觉到有的论者其实对于语言教学与文化问题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弄清楚,因而使人感到大家说的并不都是一回事,很有“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劲头。如果大家都了解一些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也许有些方面就不必争论了,讨论的起点也就可以更高一些了。

前面说过,本书的论题涉及古今中外。我想,研究这个题目,陈申博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在出国前已经是一位教育学的专家了;出国后读硕士、博士学位,专攻语言教育学。学成之后又长期在国外边从事理论研究,边做培养汉语教师的工作,因而他非常熟悉、并能准确地把握国外的语言教学理论和学术动态,深入那里的教学实际。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几位看过书稿的国内外专家就都一致给予好评。此次出版之前,他又对全书作了一次认真的

II

加工,补充了新的材料,可见他治学态度之严谨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谨以上面这一点感想,祝贺本书的出版。

鲁健骥

1998年6月5日

前言

这是一本酝酿了多年才写成的学术著作。本书试图探讨当今外语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在外语教育中实施文化教学？

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文化热与出国潮。趁着这股热潮，我跨洋越海，来到澳大利亚求学。初抵异国他乡，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语言文化问题：用外语交际言不达意，力不从心；更令人困惑的是，对外国文化了解甚微，虽然“入乡”却难“随俗”。我从自己在中国接受外语教育的经验中体会到了文化教学是中国外语教育中亟待改进的问题，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的初衷。

毋庸置疑，中国外语教育有许多成功之处。但是以往的外语教育并没有将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目标，与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语言技能相提并论，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的外语教育对文化这一要素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实践中几经反复，道路曲折。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起着继承与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外语教育不仅需要完成总体教育的任务，还起着介绍、引进外来文化，并与之交流的特殊作用。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先搞清楚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与变革这对矛盾，才能回答一系列具体的实际问题，诸如：外语教育中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应当怎样确定文化的内容、实质和范围？在教学上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在西方浩如烟海的文库中，我并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毕竟

博览群书,开卷有益,至少看清了两点:1.有关如何在外语教育中实施文化教学的课题是一个国际性的棘手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摸索和寻找可行的方案,国外的实践反映出一个对文化教学从忽略到重视、从单一到综合的动态过程;2.西方有关对中国外语教学的研究,多数采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来评述中国的情况,建设性的提议相当有限,中国的问题还要依靠中国人来解决。

在参阅了大量国内文献,经过了反复的独立思考以后,我在自己的论文中,论述了外语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分析了西方各种文化教学方案,并提出了个人见解,创立了新的理论框架,建议把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作为外语教育中进行文化教学的目标,从而对西方现存的多种文化教学方案扬长避短,实施多方位的教学,使语言文化并进,培养跨世纪的创新人才。作为学生的研究习作,我的论文早已通过。但其中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提的建议是否在国内行得通,却一直无法知晓。

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更上一层楼。外语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已今非昔比。以“文化语言学”为旗帜的理论探索和对国外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引进都对当前有关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大讨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热将发展成跨世纪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也同时出现一股文化热潮。自1990年起至今,西方有关外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论文与专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新观点、新理论层出不穷,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由于我目前工作的便利,有幸能及时了解这方面的学术进展,并有机会与国内外的语言文化教学同行们直接交流、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使过去一个仅仅打了逗号的研究课题能不断地延续下去。

为了参加国内方兴未艾的语言文化教学大讨论,为了得到国内同行的批评与指教,我终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充实近年来的最

新科研成果,改写成书,奉献给国内的广大外语教师。本书的正文是用英文撰写的,有三个原因:第一,希望让国内的同行能直接接触西方语言文化研究的成果,而不是通过翻译得到的第二手资料;第二,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外语教学,文字简浅,对英文读者具有广泛的可读性;第三,由于其雏形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大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科研的习作,对国内高校的研究生和将去国外研究的师生,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谨借本书如愿出版的机会,向所有帮助鼓励我成作的人鸣谢:我的两位导师 Dr. H. Moore (OIS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和 Dr. D. White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曾为我的学习与写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的热情帮助终身难忘。在将论文改写成书稿时, Prof. C.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y, USA)为我提供了最新的资料,并和我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使书稿内容更加充实。我的良师益友、退休在香港的郭兆仪老师,始终如一地定期寄送中、港、台三地出版的有关新书,使我及时获得中文文献。出版前又得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王建勤副教授和责任编辑余心乐博士的鼓励与指点。最后又承蒙曾在澳大利亚新州教育部担任外语教育(中文)顾问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鲁健骥先生百忙拨冗,审稿作序,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都为本书的问世倾注了汗水。

最后,欢迎读者们的批评。

作者于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内 容 提 要

第一章 历史性课题:外语与文化教学

如何在外语教育中实施文化教学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难题,也是中国外语界极为关注和讨论争议的一个热点。作为全书的出发点,本章用历史回顾的方式,对即将探讨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检查与剖析,以便将引起问题的内外因素、来龙去脉、关键点一一列出,为探索方向首先设置路标。

中国外语教育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一开始就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息息相关。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外来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直接左右着外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实施。在中国历史上,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经历了“禁”、“代”、“选”,并在这三者之间钟摆式地左右徘徊。“禁”与“代”作为两个极端固不可取,“选”的模式也难以把握。建国以来的外语教育同样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气温的升降而变化,重复出现在“禁”、“代”、“选”之间的摆动。当今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形势,将文化教学再次提到外语教育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历史经验表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制约:一个是政治因素,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中国对外关系;另一个是教育因素,中国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全民教育中应有的位置与比重。因此,正确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二章 多样性选择:文化教学诸方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世界各国对外语教育中实施文化教学

的探索中,有没有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呢?本章将视角转向国外,特别是西方操英语国家,对西方现存的文化教学方案进行扫描,并分析评价各种方案对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参考价值和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可行性。

纵观西方的经验,可以发现在外语教育中引进文化教学的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忽略到重视、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变过程。对外语教育中文化的定义,包括对文化的内容、性质、范围的确定也显示出了一种动态的扩展与深入。西方现存的文化教学方案可以归纳成三种类型:首先,以“区域文化学”为代表的方案反映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外加型文化教学方案;其次,以“交际教学”为旗帜的方案体现了一种以行为为重点的融合型语言文化教学方案;最后,以“跨文化交际”为标志的方案开拓了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综合型文化教学方案。这三类方案恰好反映出三个互相联系、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发展阶段。

西方的实践证明,三类方案各有利弊,本质区别在于对文化本身的含义的解释和对语言文化两者关系的解释。国外的文化教育方案给中国的外语教育提供了参考,但不等于是有了解成的答案。

第三章 实质性矛盾:传统与变革之争

怎样正确处理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呢?本章重新回到一开始就指出的关键问题。笔者通过对历史上用“中体西用”的思想来指导中西文化关系的做法的分析与批评,揭示了直接影响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的一对矛盾:传统与变革;并根据外语教育在当今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起的作用,确立了文化教学在外语教育中应有的位置。

历史上“体”与“用”的划分,反映出一种人为的假设与主观意愿,企图将学习外来文化之后可能产生的变化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的诸方面是互相关联、互为依赖

的,自然也在实践中行不通。本章建议的一种开放式的选择模式,不是在学习外来文化之前就事先确定选择什么,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决定取舍。这种动态的选择不脱离本民族传统,却以传统为基础,谋求在与外来文化的互相作用过程中创新与变革,并且承认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人的内在变化是影响社会外部变化的动因。

作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外语教育不仅承担着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的使命,还负有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因此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应当包含一个多方位的三维学习模式,强调双向文化互相作用,强调通过学习而创新。

第四章 国际性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本章以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外语——英语为实例,围绕三个问题来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第一,科技英语是否可以作为“文化中性”的外语来学习?第二,英语使用的国际化是否会导致它与相关文化相脱离,而变成一种可以与任何文化相结合的语言载体?最后,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怎样理解英语是学习外来文化的“工具”?

尽管科技英语在最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度,传递的是国际间普遍性的科技信息。但是,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科技英语时,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势必与科技英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价值相互作用。因此,科技英语并不是“文化中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英语变成国际文化交流的媒介和多种英语变体的产生并没有否定英语与相关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而是体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不断发展;英语使用的国际化同时也显示出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变通性。因此,用英语表达双向文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吴承认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和发展的关系,那

么,对“外吾工具论”的观点就应当重新评估。英语不仅反映各国文化,也是各国文化交流的手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英语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也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国际舞台。

第五章 建设性提议:培养文化创造力

在理论上阐明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并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之后,本章回答了在外语教育中如何实施文化教学这个最初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提案,建议将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作为外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目标,采取较为完整的教学步骤,兼取各家所长,实施多方位的文化教学。

西方外语教育中有一个反复强调的概念,即“交际能力”。但这种“能力”包含着“技能”与“水平”的双重意义,而用来衡量这种技能与水平的标准的尺度往往是操母语者的语言与文化。换言之,这种能力代表了一种规范,强调的是对某种传统的效仿。本书所提的“文化创造力”以中国文化环境为前提,专指通过外语教育而获得的创新力量,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新事物互相作用下而激发出来的求新动力。这个理论框架试图将文化的几种内涵——知识、行为和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在语言交际的层次上,而且在文化交流的层次上,全面教育培养学生。

文化创造力的提出,一方面要求文化教学不能仅顾内容,应当同时重视教学过程;另一方面要求对教与学的关系也做适当的调整,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放在首位,不仅从教的角度,而且从学的角度去考虑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第六章 开放性结尾:尚未完成的研究

作为全书的结尾,本章对全文做最后总结。本书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时事性强的课题,不少论点都受许多学科现阶段

的理论与实践影响,所提的建议也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本文所做的回答也是一个暂时的、开放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答案。

本书探讨的问题同时涉及政治与教育两个方面。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内形势与对外关系直接影响外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实施。传统与变革这对矛盾是决定如何有选择地学习外来文化的实质性矛盾。从教育的角度看,全民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包括培养源源不断、继往开来的创新人才。在外语教育中,文化的定义包括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和某种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教学应当是多方位的,与语言教学同时并进,强调学习外语中的双向文化互动。由此而产生的外语学习者的内部变化和求新力量是“文化创造力”的基础。这个概念将有利于把文化看做知识、行为和意义三者的结合,从内容与过程、教和学等诸方面综合考虑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其他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都一一提及,例如怎样在外语课程设计中考虑文化创造力?对文化教学的结果如何进行评估和测试?这些都是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

CONTENTS

序	(I)
前言	(V)
内容提要	(IX)

CHAPTER 1 A HISTORICAL PROBLEM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1)
1.1 A historical trilogy	(2)
1.2 Two ways of selection	(16)
1.3 Old problems in new form	(26)

CHAPTER 2 OP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CULTURES IN LANGUAGE PROGRAMMES	(50)
2.1 Paradigm 1: explicit cultural studies	(51)
2.2 Paradigm 2: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73)
2.3 Paradigm 3: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93)

CHAPTER 3 MAINTAINING TRADITION OR MAKING CHANGES THROUGH CULTURE LEARNING	(121)
3.1 Contradiction: tradition and change	(122)
3.2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45)

3.3 The notion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50)
CHAPTER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AND ITS RELEVANT CULTURES	(164)
4.1 EST; culturally-neutral?	(165)
4.2 EIL; culturally-arbitrary?	(184)
4.3 EFL in China: source and means	(201)
CHAPTER 5 FOCUSING ON CULTURAL CREATIVITY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19)
5.1 Clearing the ground	(220)
5.2 Focusing on cultural creativity	(230)
5.3 Implications for EFL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248)
CHAPTER 6 SUMMARY AND CONCLUSION	(262)
BIBLIOGRAPHY	(270)

CHAPTER 1

A HISTORICAL PROBLEM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of foreign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However, there are diverse propositions and arguments about the pedagogical treatment of culture. How to teach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a problem faced by language educato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question is not simply a pedagogical one. It is very complicated since the answer relies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om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 giv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In this opening chapter, we are going to have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China. China's relations with foreign peoples and cultures have a long and vexed history. At first glance,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eems a purely educational or pedagogical issue. However, if we consider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purpose of and, to a large extent,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have been always determined by China'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